

《临川先生文集》年月与阶官疑误十一则

寿 涌

摘要:《临川先生文集》流传几近千年,由于一些数字或年号的字形比较相似,于是在转抄翻刻的过程中便生了鲁鱼亥豕的混同,使得某些文章的所记年月与官职产生了舛误。这些舛误可能要影响到文章的编年,也影响到对作者和其他人物的行实仕履的判断。故此应当指出,并加以纠正。文中依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为据,对一些年月、官职之误进行了分析、说明和辨正。

关键词:《临川先生文集》;年月;官职;疑误

中图分类号: K8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9)02-0024-07

北宋时代,王安石文集的版本曾有多种。但流传到如今,就只有两种了。一是源于南宋绍兴十年(1140)的詹大和刻本,即所谓临川本《临川先生文集》。上世纪中叶,北京中华书局曾以詹大和刻本为底本,排印出版了通行本《临川先生文集》。^①二是源于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左右的龙舒刻本,即所谓龙舒本《王文公文集》。上世纪七十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又以龙舒刻本为底本,排印出版了通行本《王文公文集》。^②

《临川先生文集》流传几近千年,其中绝大多数作品为王安石所写,版本真实可靠。当然不足之处也有。如诗歌有误收他人者,文章有漏收他书者,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整理。此外,文集所有作品在文字词语舛误方面的审核也颇有工作要做。众所周知,这一方面的工作极为艰巨和繁琐,除了校勘版本、考辨异同之外,对文本本身的深入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有些问题只有在研究和比较之中才能得到揭示和解决。本文即基于这一思路,依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有关记载,专门讨论通行本《临川先生文集》中误记年月和误记阶官的有关问题,并与通行本《王文公文集》略作一比较。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散文误记年

月,计七则。第二部分讨论散文误记阶官,计四则。第三部分是附录,专门讨论《临川先生文集》未载、然而《王文公文集》和王诗李壁注本却收有的《谢郑宣秘校见访于钟山之庐》一诗诗题有误,其中所记的阶官“秘校”当为“秘书丞”之误。

本文初稿完成于2006年5月12日。是以为记。

一 散文所记年月疑误七则

文章中的年月记载是十分重要的。年月若有误记,则文章的编年就可能会误置,而文章编年若有误置,则作者的行实必将会错乱,或者相关墓碑传主的生卒年月也要产生舛误。此问题不可小视。

《临川先生文集》中记年有误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乃是卷99中的《长安县太君王氏墓志》(按《王文公文集》题作《长安县太君墓表》)。此墓志系王安石为其大妹王文淑而作。墓文曰:“君二女:长不慧,不可以适人;其季,殿中丞龚原妻也。十六年(按《王文公文集》同),葬江州德化县。兄安石为志如此,弟安上书丹。”此处的“十六年”明显有误,四库本正其为“卜六年”是有道理的。这样,王安石在元丰六年作《长安县太君王氏墓志》就可以得到正确的公认。^③

①《临川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

②《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收稿日期:2007-05-07

作者简介:寿涌(1946-),上海人。上海市黄浦教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③《临川文集》卷99,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05册,第832页上。按此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临川文集》和中华书局通行本《临川先生文集》所采用的工作本均属同一底本,即均是来源于南宋绍兴十年(1140)的詹大和刻本。考影印本《临川文集》除了在卷99中对“十六年”这一条作了正误之外,对本

可是这一例子太特殊了，因为其简直错得不可思议。正是因为其错得不可思议，才可能格外引人注目，从而会较快得到纠正。然而王安石散文中还有一些比较隐蔽的、不那么醒目的误记年月，这些年月的误记同样影响到了文章的编年，它们也应当得到纠正。只有在它们一一得到纠正之后，原文的编年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定。

当然，这些年月的误记，可能源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有的可能是王安石本人在行文时，仅凭记忆落笔而成；有的可能是王安石本人未误，而系传抄者在抄录时不小心致误；还有的可能是原文未误，仅系制版印刷者大意致误，而校对者又疏忽于一时未能发现。总之，字形相似，鲁鱼亥豕，当缜密辨别，谨慎纠正。

现积所得七则，以供学界指正。

一，《临川先生文集》卷 38 《伍子胥庙铭》

（按《王文公文集》卷 35 题作《伍子胥庙记》）

本文叙述曰：“康定二年，予过所谓胥山者，周行庙庭。”“后九年，乐安蒋公为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与为铭也。”（按《王文公文集》文字同）在这段叙述中，“后九年”三字的记叙可能有误。清顾栋高《王荆公年谱》卷上把王安石这篇文章的编年定在皇祐元年（1049），并不正确。

众所周知，康定二年即庆历元年（1041），“乐安蒋公”就是蒋堂。如果“后九年”三字的记叙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一年就应该是皇祐二年（1050），蒋堂为杭守，王安石“与为铭”。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宋史·蒋堂传》记述曰：“（知益州），徙河中府，又徙杭州、苏州。以尚书礼部侍郎致仕。”^①《姑苏志》卷 3 守臣题名记载曰：“蒋堂，皇祐元年正月乙卯，自杭州再任。二年十月，改给事中仍旧任。三年四月丙午，以礼部侍郎致仕。”^②两相对照，问题就清楚了。既然蒋堂在皇祐元年正月已从杭州调任苏州，那他怎么可能在皇祐二年还“为杭守”呢？王安石又怎么可能在皇祐二年“与为铭”

呢？

故事实的真相应该是：《伍子胥庙铭》中的“后九年”当为“后七年”之误。九与七形近，雕版刻字时容易混淆致误。“后七年”应是庆历八年（1048），这一年蒋堂系由河中府徙杭州。

考《长编》卷 153 庆历四年十二月甲辰记事曰：“龙图阁直学士、吏部员外郎知秦州文彦博为枢密直学士知益州，代蒋堂也。”^③

是则对蒋堂知杭州前后数地的调任年月，可以详列如下：

庆历四年（1045）十二月甲辰，由知益州调任河中府。

庆历八年（1048），任河中府三年秩满，由知河中府调任杭州。

皇祐元年（即庆历九年，1049）正月乙卯，在杭州任职一年，由杭州调任苏州。

皇祐三年（1051）四月丙午，在苏州任上以礼部侍郎致仕。

综上所述，文中所记的“后九年，乐安蒋公为杭使”一语，应据史实更正为“后七年”。王安石此文实作于庆历八年，顾栋高《王荆公年谱》对此文的编年有误。

二，《临川先生文集》卷 40 《辞赴阙状一》

（按《王文公文集》卷 17 题作《辞赴阙状（系其中三篇的第一状）》）

本文题下原注曰：“治平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按《王文公文集》文字同）。”清顾栋高《王荆公年谱》和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也均认定是“七月二十七日”。然《续资治通鉴长编》记朝廷下令复王安石原官一事，乃在治平二年十月。

《长编》卷 206 治平二年十月甲午记事曰：“复以王安石为工部郎中知制诰，母丧除故也。”^④考十月甲申朔，甲午为十一日。则题下原注之“七月”或为“十月”传抄之误？七与十形近而易混淆。先是十月十一日有朝命，后是十月二十七日有辞状一，如此较为合理。

其二，若是《辞赴阙状一》作于治平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则朝廷下令复官必在七月，此又与当时习俗不合。据曾巩为王安石生母所作《仁寿县太君吴氏墓志铭》所记有曰：“嘉祐八年八月辛巳卒于

文指出的其它各卷中的七条疑误年月数字均未有质疑或更动。也即是说，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临川文集》各卷中其它七条疑误年月数字，均与中华书局通行本《临川先生文集》相同。本文第二部分的阶官所误之处亦当与此类似。

①《宋史》卷 298，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 年 11 月版，第 28 册，第 9913 页。

②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 493 册，第 39 页下。

③影印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5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2 月版，第 2 册，第 1423 页上。

④《长编》卷 206，第 2 册，第 1912 页下。

京师，十月乙酉葬于江宁府之蒋山。”^①按古代一般习俗，父母去世之后，子女居丧守制当满 27 个月。可是从嘉祐八年八月到治平二年七月，尚不足 24 个月，唯有到十月，才几近 27 个月。故从这一角度观察，只有在十月时，朝廷下令复官和王安石连作辞状才比较合理。

综上所述，原注“治平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或为“治平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之误。

三，《临川先生文集》卷 71 《伤仲永》（按《王文公文集》卷 33 题同）

此文的编年较难落实，其关键是文中有云：“明道中，从先人还家”。“又七年，还自扬州（按《王文公文集》文字同）。”一些研究者据此便定《伤仲永》为“康定元年作”，实乃为误。

本来据文中“又七年”定为康定元年，自当不误。然康定元年之说难以解释“还自扬州”之疑。康定元年时，王安石 20 岁，正因父逝而寄居江宁，服丧攻读，实无“还自扬州”其事。而其后“还自扬州”之经历，则是在庆历三年三月。当时王安石已在扬州淮南判官任上，因省亲告假，返回临川。

如此则可以怀疑：“七年”或系“十年”传抄之误。此虽无《长编》所记为据，但考之王氏行年则已可知。从明道二年到庆历三年，正为十年。故王安石此文或作于从扬州返回临川省亲之后。蔡上翔《考略》认为此文作于庆历三年是正确的，问题是蔡氏没有指出此“七年”二字有疑。如正其“七年”为“十年”，此间矛盾便可解决。

疑其“七年”为“十年”之误，还可以找到一个佐证，即是文集卷 76 的王安石同年省亲时所作的《上徐兵部书》一文。

《上徐兵部书》有云：“暮春三月，登舟而南。”“展先人之墓，宁祖母于堂，十年紫郁，一旦释去。”此处的“十年紫郁”，正是指王氏曾于“明道中”随父亲“还家”省亲，然后又在庆历三年告假回归“宁祖母”的怀亲思绪。其间相隔，正好整整十年。

故《伤仲永》中的“又七年”或为“又十年”之误。

四，《临川先生文集》卷 89 《广西转运使孙君墓碑》（按《王文公文集》卷 89 题同）

孙君为孙抗，此碑文记孙抗卒年有误。

孙抗为广西转运使时，抗击侬智高有功。碑文记曰：“以劳迁尚书司封员外郎。”碑文又记曰：“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按《王文公文集》的文字作“皇祐二年三月七日”）卒于治所，年 56。官至尚书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勋至上骑都尉。”然碑文如此记述孙抗这段事迹，实为有误。

考《长编》卷 174 皇祐五年四月甲戌记事曰：“广南西路转运使孙抗、转运判官孙咸、提点刑狱朱寿隆、同提点刑狱高惟和……以邕州平，并迁官。”^②既然皇祐五年孙抗尚得以迁官，则何来皇祐三年“卒于治所”？其“皇祐三年”四字必然有误。

以下试从孙抗的阶官升迁经历来探求其真实卒年。孙抗因抗击侬智高有功，于皇祐五年迁官为尚书司封员外郎。其卒时为尚书工部郎中。按司封员外郎属吏部，为前行；工部郎中为后行。孙抗由前行员外郎升迁为后行郎中，当需三年的时间。如此算来，孙抗至嘉祐元年可升迁为工部郎中（后行），又至嘉祐四年可升迁为某部郎中（中行）。现孙抗官至工部郎中即卒，是则得工部郎中（后行）一、二年而未得某部郎中（中行）。如此而言，莫非孙抗卒于嘉祐三年？

故碑文中的“皇祐”或为“嘉祐”之误，孙抗的卒年应该是嘉祐三年三月初七日。

五，《临川先生文集》卷 91 《王平甫墓志》（按《王文公文集》卷 88 题作《平甫墓志》）

王安国，字平甫，王安石大弟。

此墓志所记王安国卒年有误。文曰：“官止于大理寺丞，年止于 47，以熙宁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按《王文公文集》文字同）。越元丰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宁府钟山母楚国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照理王安石记自己大弟的卒年不当有误，然据《长编》所记有关王安国的生平事迹，《王平甫墓志》中的“七年不起”之述必误。

考《长编》卷 259 熙宁八年正月庚子记事曰：“著作佐郎、秘阁校理王安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③

又《长编》卷 277 熙宁九年七月己卯记事曰：“复放归田里人王安国为大理寺丞、江宁府监当，

^①《元丰类稿》卷 45，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 1098 册，第 726 页上。

^②《长编》卷 174，第 2 册，第 1606 页下。

^③《长编》卷 259，第 2 册，第 2428 页下。

命下而安国病死矣。”^①

据《长编》上述两则记事可知：

- 一、视王安国卒于熙宁七年八月十七日必误，因其八年、九年还活在人间。
- 二、王安石所记王安国“官止于大理寺丞”，与《长编》熙宁九年七月己卯记事相合，说明王安国在世时是接受了任命的。
- 三、考九年七月癸丑朔，己卯是二十七日。则王安国逝于八月十七日，确实是“命下而安国病死矣”。

因而可以断定：王安石《王平甫墓志》的“熙宁七年”必为“熙宁九年”之误，此或系传抄、印制而误。

这一纠正涉及到王安石文集中卷 59《中使传宣抚问并赐汤药及抚慰安国弟亡谢表》一文的编年正确与否。若依《王平甫墓志》中的“七年不起”之说为据，《中使传宣抚问并赐汤药及抚慰安国弟亡谢表》一文的编年就得在熙宁七年八月。若能正“熙宁七年”为“熙宁九年”之误，则《中使传宣抚问并赐汤药及抚慰安国弟亡谢表》一文的编年就该在熙宁九年八月。比较下来，显然只有后者才是对的。

六，《临川先生文集》卷 92 《广西转运使屯田员外郎苏君墓志铭》（按《王文公文集》卷 88 题同）

苏君为苏安世，字梦得。此墓志记其卒年有误。

此墓文文末有王安石自题云：“太常博士、知常州军州事临川王某为铭曰……”则此文作于嘉祐二年无疑。然而文中曰：“君既卒之三年（按《王文公文集》文字同），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扬州之江都东兴宁乡马坊村。”嘉祐二年往前推算三年，则是至和元年。如此而言，文中“卒之三年”之说必然有误。

因为《长编》卷 181 至和二年十一月己巳记事有曰：安南王李德政卒，“命广西转运使、屯田员外郎苏安世为吊赠使。”^②既然至和二年十一月时苏安世尚可出使安南，则依据文中“卒之三年”的记述去推算其卒于至和元年，就显得颇为荒谬。

实际上，苏安世当卒于至和二年出使安南之后。只有如此，才能正确连接上下文的文脉，贯通上下文的文意。所以，此墓志中的“卒之三年”当为“卒

之二年”之误。

至和二年年底，苏安世出使安南，返回时或是因劳累过度，或是因染上了南方的某种疾病，回到广西后不治而亡。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之。此当即“君既卒之二年”之真意。

七，《临川先生文集》卷 96 《马汉臣墓志铭》（按《王文公文集》卷 96 题作《马汉臣墓志》）

马仲舒，字汉臣，王安石早年的学友。

此文因有“庆历六年（按《王文公文集》文字同），汉臣冠五年矣，从予入京师待进士举”数语，有些学者便视其作于庆历六年，以为王安石庆历六年时从扬州淮南判官任上返京，马汉臣则随其入京参加朝廷的礼部试，其实误矣。

其一，考《长编》卷 158 庆历六年正月甲午记事有曰：“命翰林学士孙抃权知贡举。”^③据此，庆历六年春朝廷有礼部试。然按照当时考进士的惯例，各地举进士者必须要在礼部试的前一年，也即是在庆历五年的秋季赶到京师，先参加秋季国子监的初试选拔，然后才能参加来年春天的朝廷礼部试。以此视之，马汉臣要想在庆历六年入京去参加庆历六年春天的朝廷进士考试，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此还可参阅王安石《送陈兴之序》一文的相关记述，其序文对陈兴之参加庆历六年春天朝廷礼部试前后的情况有概要记载。

其二，王安石从扬州淮南判官任上返京的时间，也并不是在庆历六年，而是在庆历五年秋。考王安石文集中卷 84 有作于庆历六年秋天的《送陈兴之序》，其序曰：“公之子（陈）兴之主泰（州）之如皋簿，某为判官淮南，以事出如皋，遇之，相好也。其后二年归京师，兴之亦以进士得嘉庆院解，复遇之，相好加焉。”王安石庆历二年进士及第判官淮南，理当在庆历五年任满移官。文中曰“其后二年归京师”，即是指庆历五年回京候阙，则其出如皋遇兴之应是庆历三年之事。又因为陈兴之要参加庆历六年春天的朝廷礼部试，所以他才在庆历五年秋“得嘉庆院解”，在秋天赶到了京师。

问题很清楚，既然王安石已经明言：“其后二年归京师，兴之亦以进士得嘉庆院解，复遇之，相好加焉。”这就充分证明，庆历五年秋天时，王安石已经人在京师。既然如此，则何来庆历六年王、马二人同入京师之事呢？

①《长编》卷 277，第 3 册，第 2609 页下。

②《长编》卷 181，第 2 册，第 1676 页上。

③《长编》卷 158，第 2 册，第 1458 页上。

既然已经可从史实上加以肯定，庆历六年王、马二人同入京师必然为非，则墓文所记“庆历六年”就必然有误。

按文中先曰：“汉臣长予四年。”后又曰：“庆历六年，汉臣冠五年矣。”据此算来，庆历六年时，马汉臣为25岁，王安石为21岁。而实际上庆历六年时王安石已经26岁矣。这样的记年又与事实根本不相符合。

只有在庆历元年时，马汉臣为25岁，王安石为21岁，才与事实相符。

因而可以断言，文中所述“庆历六年”为非，而当以“庆历元年”为是，此“六”字实为“元”字之误。此言庆历元年时，马汉臣随王安石由金陵入京师待进士举。

故墓志所叙述的事实是：马汉臣大王安石四岁，在金陵时一起为同学。庆历元年五月，王安石为父守丧已经服除，决定赴京赶考，参加庆历二年春天的朝廷礼部试。马汉臣则跟他一起入京待考。然到京后二人均染上疾病，马汉臣不幸于六月病故。后马汉臣之棺由其叔父护送回金陵殡之。

墓文最后记曰“某年某月乃葬于某处”，是则非庆历元年下葬。此文编年当无考。定其为庆历年间可也，具体年月则不必无谓臆测。

二 散文所记阶官疑误四则

笔者在阅读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时，发现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有些人物的阶官叙述与《临川先生文集》的记载不相符合。经比较分析，可以肯定《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是正确的，而王安石诗文中的所记为误。当然，《临川先生文集》中这些阶官的误记，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有的可能是王安石本人在行文时，因收集的资料有误而导致差错；有的可能是王安石本人未误，而系传抄者在抄录时不小心致误；还有的可能是原文未误，而由雕版印制者致误，且校对者又疏忽于临时而未能发现。总之，时间一长，也就将错就错了。时至今日，似当缜密辨别，谨慎纠正。

现积所得四则，以供学界指正。

一，《临川先生文集》卷77 《答孙元规大资书》（按《王文公文集》卷6题同）

孙沔，字元规，王安石在鄞县时的上司，曾在皇祐三年年初知明州数月。此信作于皇祐三年年初

孙沔初到明州之时。其时王安石已在皇祐元年“罢县守阙”，但并未离开鄞县。孙沔调任知徐州后，王安石也偕同全家返京候阙。此信标题中的阶官名“大资”有误。

按《长编》卷170皇祐三年七月乙亥记事曰：“初，龙图阁直学士、吏部郎中孙沔既除母丧，授陕西都转运使。沔求知明州，许之。于是京东多盗，乃涉沔知徐州。沔明购赏诛罚，盗以故止。”^①据此，王安石作此书时孙沔的阶官只是龙图阁直学士和吏部郎中。而信题称“大资”，“大资”谓资政殿大学士，与此不合。

《宋史》本传记曰：“以资政殿学士知杭州。迁大学士，徙知青州。”^②《长编》卷176至和元年二月壬戌记曰：“（孙沔）授资政殿学士知杭州。”^③又考《东都事略·孙沔传》记曰：“以资政殿学士知杭州……迁大学士，移知青州。”^④考《乾道临安志》卷3记曰：“至和元年二月壬戌，以枢密副使、给事中孙沔为资政殿学士知杭州。嘉祐元年八月戊午，加资政殿大学士、京东东路安抚使知青州。”^⑤所有这些史料都足以证明：孙沔是在嘉祐元年八月才得到“大资”的，故此“大资”二字，必是后人编集时误植而入，应当加以纠正。

又王安石文集卷80中还有作于皇祐三年春天的《谢孙龙图启》一文，信中感谢孙沔对自己的厚爱，在孙沔离开明州赴任徐州之时，专为致谢。此启可与此书相为参照，此启的标题记孙沔的阶官当为正确，此时应为孙龙图，即龙图阁直学士。

故原书的标题当更正为《答孙元规龙图书》。

二，《临川先生文集》卷91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志铭》（按《王文公文集》卷88题同）

此文文题中的“致仕田公”指的是田况，但田况致仕时所带的阶官并不是“太子太傅”。

考《长编》卷198嘉祐八年二月乙酉记事曰：“太子少傅致仕田况卒，赠太子太保，谥宣简。”^⑥《宋史》本传亦记曰：“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赠

①《长编》卷170，第2册，第1568页上。

②《宋史》卷288，第28册，第9689页。

③《长编》卷176，第2册，第1624页下。

④《东都事略》卷70，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382册，第454页上。

⑤《乾道临安志》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484册，第93页下。

⑥《长编》卷198，第2册，第1829页上。

太子太保，谥宣简。”^①又《王文公文集》本文记曰：“以太子少傅致仕”，“诏赠太子太保”。是则《临川先生文集》中本文所记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诏赠太子太傅”不确，“诏赠太子太傅”当是“诏赠太子太保”之误。

故综上所述，自然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的《临川先生文集》的文题《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志铭》必误，其中的阶官“太子太傅”应是“太子少傅”。所以，正确的文题应该是《太子少傅致仕田公墓志铭》，或是《赠太子太保致仕田公墓志铭》。

三，《临川先生文集》卷 92 《司封郎中张君墓志铭》（按《王文公文集》卷 91 题同）

此文文题中的“张君”指的是张式，但是张式在官去世时的阶官并不是“司封郎中”。考《长编》卷 168 皇祐二年四月戊辰记事曰：“开封府判官祠部郎中张式知岳州。”^②《临川先生文集》本文记曰：“召为开封府推（按为判）官，出知岳州。皇祐二年九月六日卒，享年 62，官至尚书祠部郎中。”

《王文公文集》本文记此全同。可见张式临终时的阶官是“祠部郎中”，所以正确的文题应该是《祠部郎中张君墓志铭》。

四，《临川先生文集》卷 95 《兵部员外郎马君墓志铭》（按《王文公文集》卷 91 题同）

马君为马遵，字仲途，王安石好友。此墓志铭标题所记马遵的最后阶官为“兵部员外郎”有误。

文中记曰：“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罢职以出，至五、六，乃以为尚书吏部员外郎、直龙图阁，犹不许其出。其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

考《长编》卷 186 嘉祐二年十一月丁丑记事曰：“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马遵为吏部员外郎、直龙图阁，以疾自请也。遵寻卒。”^③又《宋史》本传亦记曰：“以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改吏部、直龙图阁，卒。”^④

综上所述，可见马遵临终前的最后阶官应为吏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墓文标题中的“兵部员外郎”实为“吏部员外郎”之误。

故原文的标题当更正为《吏部员外郎马君墓志铭》。

①《宋史》卷 292，第 28 册，第 9783 页。

②《长编》卷 168，第 2 册，第 1544 页下。

③《长编》卷 186，第 2 册，第 1716 页上。

④《宋史》卷 302，第 29 册，第 10022 页。

三 附录：

非是“秘校”，应是“秘书丞”

——《谢郑亶秘校见访于钟山之庐》诗题阶官正误

《谢郑亶秘校见访于钟山之庐》一诗虽然不载于《临川先生文集》，但《王文公文集》卷 62，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 37，^⑤以及影印古朝鲜活字体本《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 37 皆收之，^⑥故对此诗的真实性不当有疑。今后修订王安石全集时，应当补入《谢郑亶秘校见访于钟山之庐》。但是此诗诗题有误，“秘校”应是“秘书丞”。

郑亶，字正夫，又为正甫，太仓人。仁宗嘉祐二年进士及第，初任睦州团练推官，后知於潜县。

《长编》卷 240 熙宁五年十一月癸丑记事有曰：“睦州团练推官、知於潜县郑亶为司农寺丞、两浙路提举兴修水利。”^⑦又据《长编》卷 275 熙宁九年五月己巳所记，时已为“司农寺主簿”。^⑧

按“秘校”为秘书省校书郎之俗称，属北宋阶官的最低级别，往往为进士及第初获官职时所得。如曾巩《刑部郎中张府君神道碑》所记王安石本人庆历二年进士及第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时，当时的阶官即是秘书省校书郎。^⑨北宋阶官一般是三年一迁，故郑亶若以“秘校”身份拜访王安石的话，势必只能在嘉祐二年至嘉祐五年之间。然而嘉祐二年至嘉祐五年时，王安石正忙于政事，先知常州，再提点江东刑狱，后又入京为度支判官，岂有可能在“钟山之庐”接见郑亶？

再看王安石诗中所云：“误有声名只自惭，烦君跋马过茅檐。已知原宪贫非病，更许庄周知养恬。世事何时逢坦荡，人情随分值猜嫌。谁能胸臆无尘滓，使我相从久未厌。”全诗心情恬淡，表示了对仕途生涯的几许厌倦，对人间真情的十分向往，完全是晚年偏寓钟山时的诗风。故诗题中的“钟山之庐”，必是王安石在白下门外、钟山南侧的半山寺故宅。此诗定是王安石的晚年之作，郑亶的阶官“秘校”二字必定有误。

⑤《王荆文公诗笺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 年 11 月版。

⑥《王荆文公诗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版。

⑦《长编》卷 240，第 2 册，第 2240 页上。

⑧《长编》卷 275，第 3 册，第 2590 页下。

⑨《元丰类稿》卷 47，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 1098 册，第 751 页上。

考《长编》卷 302 元丰三年二月丙午记事曰：“翰林学士、右正言知审官东院章惇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①又《长编》卷 370 元祐元年闰二月（按无日）记事曰：是月，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及惇（按章惇）参知政事，秘书丞郑亶者邪险急进，素为惇所喜，迎合惇意，推仿湖南之法……”^②依据上述记载，则元丰三年时，郑亶的阶官已为秘书丞矣。

又考《长编》卷 334 元丰六年四月壬子记事有云：“江淮等路发运司言……乞取问转运判官郑亶。”^③《长编》卷 340 元丰六年十月庚辰记事曰：“江东转运判官郑亶见有罪被劾而乞上殿。”^④《长编》卷 341 元丰六年十二月戊子记事有“奉议郎郑亶”。^⑤如此而言，元丰五年冬时，郑亶又已为奉议郎、江东转运判官。

按北宋神宗朝元丰五年行新官制，旧官转新官，秘书丞正对应奉议郎。显然诗题中的“秘校”实为“秘书丞”之误。王安石是当时官员，必定熟悉官职称呼，他决不至于会把“秘书丞”误会成“秘校”。此必是后人在传抄刻写的流传过程中，把“秘书丞”误写成了“秘校”且不自知。

上文所引《长编》已经说明，元丰三年时郑亶虽为秘书丞，但却因为其人在汴京朝廷，无法上门谒见王安石。而元丰五年时郑亶虽已为江东转运判官，可以谒见王安石，但却因为有了新的阶官“奉议郎”，王安石又不可能以“秘书丞”来称呼他。

所以最后只有一个结论：此诗只可能作于元丰四年新官制尚未实行之时。一方面，其时郑亶已以

秘书丞的身份外放江东转运判官，可以随时得便直赴钟山；另一方面，王安石又可以以“秘书丞”来称呼他，符合官场迎来送往之道。故原诗的标题应当更正为：《谢郑亶秘书丞见访于钟山之庐》。

**"Linchuan Gentleman Anthology" the years and
the government position doubts
by mistake eleven pieces
SHOU Yong**

(Shanghai Huangpu Educational college)

Abstract: "Linchuan Gentleman Anthology" spreads several near millenniums, because some digital or the reign title glyph quite is similar, Therefore copied in the process in the extension which turned engraves to produce has then lived Lu fish confused characters confusing, Caused certain articles to record the years and the government position to produce the error. These errors possibly must affect to the article arrange the year, also affects to the author and other character's antecedents judgment. Therefore the question cannot look down upon, must point out, and corrects. This article "Xu zizhitongjian changbian" according to Li Tao for according to, recorded the years, the government position to some carries on the analysis by mistake, explained and clarified right and wrong.

Key words: "Linchuan Gentleman Anthology"; the years; the government position; doubts by mistake nine pieces

（责任编辑：陈剑）

①《长编》卷 302，第 3 册，第 2837 页上。

②《长编》卷 370，第 3 册，第 3461 页上。

③《长编》卷 334，第 3 册，第 3109 页下。

④《长编》卷 340，第 3 册，第 3161 页上。

⑤《长编》卷 341，第 3 册，第 3175 页上。